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一卷

菩薩蠻

利名門路兩无憑

百步風前短燭

只現

了尽輸倂

話說大官

古籍整理教程

府樂清鼎有一

秀才姓時

四步生眉

目清秀

又不通紹興年

時永樂 著

河北大學出版社



間三卒不第就干臨安府衆安橋命舖弄着本
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却无官星只好出
家陳秀才自小听得母親說生下它時夢見一

时永乐 著

古籍整理教程

河北大学教材出版资助基金资助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邹卫
装帧设计：赵谦
责任印制：李晓明

古籍整理教程

著者：时永乐
出版发行：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88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125
字 数：275千字
版 次：2003年2月第2版
印 次：2003年2月第2次印刷
印 数：1001~3000册
书 号：ISBN7-81028-384-7/G·227

定价：14.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古籍概说·····	(1)
第一节 古籍与古籍整理·····	(1)
第二节 古书的体例·····	(6)
第三节 我国历史上古籍的散亡·····	(16)
第四节 古籍整理的意义·····	(21)
第二章 古籍版本·····	(25)
第一节 版本与善本·····	(25)
第二节 古籍版本的类型·····	(32)
第三节 古籍版本的鉴定·····	(46)
第四节 古籍版本鉴定应注意的问题·····	(64)
第三章 校勘·····	(75)
第一节 校对、校勘和校讎·····	(75)
第二节 古籍校勘的必要性·····	(77)
第三节 古籍校勘的方法·····	(83)
第四节 校书的条件和态度·····	(114)
第五节 校勘记的写法·····	(118)
第四章 古书的标点·····	(125)
第一节 古书的句读·····	(126)
第二节 标点古书的要求和态度·····	(134)
第三节 标点符号在古书中的用法·····	(138)
第四节 古书断句、标点致误的原因·····	(156)

第五章 古籍的注释·····	(166)
第一节 古籍旧注的类型·····	(166)
第二节 古籍旧注常用的术语·····	(177)
第三节 古籍注释的内容·····	(185)
第四节 古籍新注的体式·····	(196)
第五节 古籍注释的方法·····	(204)
第六节 古籍注释存在的问题·····	(214)
第六章 辨伪与辑佚·····	(221)
第一节 辨伪·····	(221)
第二节 辑佚·····	(233)
第七章 古籍整理的其他工作·····	(243)
第一节 撰写序跋·····	(243)
第二节 编辑附录·····	(251)
第三节 编制索引·····	(266)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271)
附录二 《四库全书总目》与《中国图书馆图书 分类法》(第三版)类目对照表 ···	(274)
附录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古籍 著录规则》·····	(280)
附录四 历代帝王名讳及代字简表·····	(309)
附录五 书影·····	(325)
后记·····	(351)
重版后记·····	(352)

第一章 古籍概说

第一节 古籍与古籍整理

“古籍”是一个很常见的名词术语，我们知其大概意思，但确切解释又颇感不易。《辞源》(修订本)、《辞海》(1989年版)均未收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收了，以“古书”二字释之，虽不能说错，但也不能尽如人意。“籍”之本义为簿书，即关于贡赋、人事及户口等的档案。《说文解字》：“籍，簿书也。”《释名·释书契》：“籍，籍也，所以籍疏人名户口也。”引申之，则有书籍之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凡著于竹帛皆谓之籍。”《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新唐书·百官志》：“秘书郎掌四部图籍。”其中的“籍”字都是书籍之义。

古籍的籍，也正是书的意思，所以《现代汉语词典》才把古籍解释为古书。古籍就是古书的雅称。古书似乎很好理解，其实则不然。到什么时候才算“古”？“古”的上限、下限分别截止到什么年代？书的范围有多大？学术界理解并不一致。

在一些古籍发展史的著作中，有的章节名称叫作《龟甲兽骨的书》、《青铜的书》与《石头的书》；也有的学者直言不讳地说：“我国早期出现的记载文字的甲骨、钟鼎，一般也可以叫作图书。”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殷商时期的龟腹甲、牛肩胛骨上面的文字，即甲骨文，从内容上说是进行占卜后刻写的卜辞，并不是为了传播知识、交流思想、总结经验，与书籍的写作、出版目的不同，可以算是档案，属于文献的范畴，而不能算作图书，即不属于古籍。青铜器

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主要记述铸、刻与所有者的名字,记述铸造的缘起,尽管有时为了夸耀功勋,文字比较长,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与书籍的形式和编写目的迥异,亦只能称作文献。至于刻石,如东汉时期的“熹平石经”、三国时魏的“三体石经”与唐代的“开成石经”,所记载的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此外,尚有大量的佛、道两家经典的刻石,出现的年代晚于正式书籍,有书籍的内容而没有书籍的形式(《现代汉语词典》:“书,装订成册的著作”),也不能视为真正的图书。从形式上说,我国最早的正规书籍应该是简策和版牍。从具体内容上说,春秋末期及战国初期,孔子及当时的一些学者根据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加以删削,编成《诗》、《书》、《礼》、《易》、《乐》、《春秋》等所谓六经,以及解释这些经书的传、说、记,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著,即所谓的先秦诸子,以及一些科技方面的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这是我国古籍时间的上限。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图书,正是这批古籍,以后各个朝代出现的经、史、子、集各种著作,当然也是古籍。

国家标准局 1987 年发布的《古籍著录规则》给古籍下的定义为:“古籍: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 1911 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这是最富权威性的定义。理解这个定义时应注意:(1)这里古籍的“古”之划分,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不同。我国历史的分期,现在一般是把从有史以来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算作古代史,鸦片战争到 1911 年这一段时间算作近代史。而古籍的下限则划到 1911 年以前,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期间产生的书籍也叫作古籍。这是因为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学术文化也马上全部起变化。从 1840 年到辛亥革命这 70 年间新出现的书籍,绝大部分的内容和形式都与以前的书籍没有多少不同。(2)1911 年也不是绝对界限。《古籍著录规则》所下定义中的“主要指”就是这个意思。辛亥革命以后一个时期内的著作,

如果在内容与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采用新体裁,如用现代汉语对古籍所作的注释或研究,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至于今天对古籍作校注,则不论采用何种体式,都只能算作是古籍整理,因为今天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古籍。

(3)古籍与线装书不完全是一回事。古籍定义中的“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话并不完全是指线装。诚然,现在存世的古籍的装订形式多数是线装,但绝不是说所有的古籍都是线装的,也不是说所有的线装书都是古籍。这是因为:一方面,真正的古籍未必一定全是线装。古籍除线装之外,还有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及蝴蝶装等多种形式。另一方面,采用线装的未必一定就是古代的书籍。如《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邓小平文选》均出版过线装本。线装形式是在蝴蝶装与包背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约在明代中期以后才被广泛使用。至于现存的线装宋版书则多是经后人改装的,并非原来的形式。(4)根据《古籍著录规则》定义中“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的话,现在重印或再版的古代书籍,不论是线装还是平装,不管是影印还是铅印,都不应属于古籍的范畴。有的属于古籍整理的研究成果,有的需加上一个限定词,叫作“新印古籍”或“新版古籍”。

在对什么是古籍有了一个大致了解以后,我们再来谈什么是古籍整理。所谓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本身进行校勘、标点、注释及今译等各种加工,使之出现新的本子,以便于今人和后人阅读利用。超出这个范围,如撰写关于某种古籍的论文,或者撰写研究某种古籍的专著,尽管学术价值很高,也不能算作古籍整理而只能算作古籍研究。有的学者把司马迁写《史记》、马克思写《资本论》,以及我们现在撰写中国通史,皆视为古籍整理。这就把古籍整理的范围划得太宽了。因为没有继承和借鉴,科学就不能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研究是“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在当代,只有充分利用科学文

献才能实现“今人的协作”及“对前人劳动的利用”。如果利用文献就算文献整理,利用古籍就算古籍整理,那么几乎世界上所有学科就都是文献整理了,很多科研论文、专著乃至一些小说、自然科学著作也都成为古籍整理了。因为其中利用了古代的资料或古人的话语。这显然不能成立。我们说不能把撰写科研论文、专著,进行文学创作算作古籍整理,只是为古籍整理划定一个界限,将其与别的学问区别开来,以便于研究、便于讲授,丝毫没有轻视它的意思,像有些人那样,视古籍整理为雕虫小技,以为它够不上学问,这方面的成果不予以承认。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古籍整理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很重要、需要广博知识的学问,其难度与撰写论文、专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能够胜任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任何轻视这项工作、这门学问的见解都是不公正的。

从事古籍整理工作需要做哪些必要的知识准备呢?首先要具有阅读古籍的能力,要有扎实的古汉语基本功。在学习古籍整理课程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古代汉语,有一点古文的基础,但是还远不够,因为第一,数量少,所讲授的不过几十篇古文,我们所学,还没有过去上几年私塾的人读的古文多,他们起码将《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读得很熟。我们很多大学生连这点基本功都不具备,在记诵之功方面尤其不能与前人相提并论。因此,准备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或研究的人,应该趁着年轻,精力充沛,记忆力好,熟读乃至背诵数十篇古文,认真阅读几部古籍,打下良好的基础。据说某高校举办古籍整理培训班,除了讲授有关知识,阅读《史记》、《汉书》等古籍外,还要求学员课下练两样基本功:一是背诵《古文观止》,二是练小楷毛笔字。这正是针对一般人的现状采取的补救措施。第二,我们学得还比较浅。古代汉语课程中,讲授的语法、文字等方面的知识还限于基本常识,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知识涉及的还比较少,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很多重要著作我们还没有

来得及阅读。所以准备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或研究的人,必须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下一定功夫,具有独立解决阅读古籍、整理古籍时所遇到的疑难问题的能力。

其次是要具有书的知识,即过去所说的目录学知识。我们这里所说的目录学知识,不同于我们现在开设的目录学概论课程,也不同于一般的中国目录学史,讲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少书目以及各自的编写体例怎样。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讲我国古籍源流的目录学,是指我国古代先后出现过哪些重要古籍,现在还保存了哪些古籍,作者是谁,主要内容是什么,在今天和当时各有什么价值等等。这种关于书的知识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使我们的古籍整理井然有序,使我们做到心中有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哪些古籍前人已经整理过,哪些前人尚未涉及到;哪些古籍重要,应该抓紧整理,哪些古籍不太重要,可以暂时放一放;二是有助于我们标点校勘古籍。古籍中经常出现书名,因为不知道是书名而将句子断错了、或前人将书名写错了而不知校改的例证不胜枚数。为了增加目录学方面的知识,我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书目,诸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四库全书总目》等,古籍整理工作者应该置之案头,经常翻阅。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我国古代的人名、地名,也是知道得越多越好。这会给我们阅读、校点古籍带来很大帮助。

再次是要有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史的知识。这不仅是因为任何书籍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然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熟悉历史,有助于我们对书籍内容、作者立场观点的理解,还在于书中涉及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避讳改字及各种名词术语等方面的内容,往往成为我们阅读、整理古籍的障碍。如果我们熟悉历史,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史知识,则有助于这些障碍的扫除。勿以为只有整理历史方面的书籍才需要了解历史,整理其他方面的古籍则可有可无。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整理各个学科

的古籍都需要历史知识。因为任何一种古籍都必然打着时代的烙印,也常常涉及到典章制度及各种文化知识。因此,古籍整理工作者学一点中国通史,读一点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著作,是完全必要的。对所整理古籍产生的时代的历史,尤其应该多下一点功夫。

上述三方面的知识,是整理各种古籍所必须具备的。其他方面的知识视古籍的内容而定。如整理文学古籍,则需要具有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的知识;整理哲学古籍,则要有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知识,对哲学流派、哲学概念要比较熟悉。其他学科的古籍同理,不赘述。

第二节 古书的体例

一、古书的作者

我们翻开现在的一部书,不论是个人写的,或者是出于集体之手,一般都清楚地标明了作者。从事中文编目或西文编目,著录时也均有著者项。比较正规的图书馆中,除书名目录、分类目录以外,还有著者目录。我们今天对某一部书籍进行研究、探讨,往往需要搞清楚作者的身世、经历、社会交往,以求对其著作有更深入的理解。孟子就曾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①清代著名学者焦循也说:“古人各生一时,则其言各有所当。惟论其世,乃不执泥其言,亦不鄙弃其言,斯为能尚友古人。”^②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今天论世知人、考察作者的身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现在的书籍一般都标明了作者。而在古代,特别是先秦,不少作品并没有标出作者的姓名。

现存的《韩非子》一书中,有《孤愤》和《五蠹》两篇作品。对于

①:《孟子·万章下》。

②:《孟子正义》卷十。

《五蠹》。人们比较熟悉，它是韩非的代表作之一，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的古代汉语教材，大都节录过，知其是一篇论述严密、很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在《孤愤》中，韩非怀着愤慨之情和势孤之感，论述了法家与当权重臣的矛盾和斗争。他指责当权重臣专权蔽主，利用各种条件内外勾结，网罗党羽，采取公开杀戮和秘密处死的手段迫害法家人物，使他们无法得到君主的了解与信任，因而造成了“主上卑而大臣重，主失势而臣得国”的严重局面。《孤愤》中所表达的思想，对最高统治者巩固其政权，有启发作用。秦王嬴政读了这两篇文章后感慨颇深。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

可见韩非的著作没有写上自己的姓名。否则，秦始皇不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就不需要李斯的介绍了。

类似的情况在汉代初期也可以看到。汉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作品亦未著明自己的姓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一段和韩非情况差不多的记载：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

可见，司马相如在自己的作品上也没有标出自己的姓名，否则，汉武帝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战国、秦汉的情况是这样。再早的作品不题作者姓名更为常见。《诗经》305篇作品除极少数几篇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都是无名氏的作品。这些诗歌的作者并没有在作品上写明自己的姓名。采诗的人把这些诗收集起来编辑成书，其目的也在于了解诗的内容，而不管这些作品是谁作的。《周易》经文的作者是谁？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很早就无人知道它出自何

人之手。正如著名学者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一书中所言：“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

先秦诸子，取名为某子，如《管子》、《庄子》等，但往往并非全部是其本人所作，不少篇章是出于其后人、弟子、宾客之手。纂集成书，时间更晚。一般情况是后人将这一学派的若干篇著作汇集到一起，取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姓，题为某子。《隋书·经籍志》把某子著录为某人撰，如“《管子》十九卷，齐相管夷吾撰”，则是欠妥当的。

汉代以后，在书上标出作者姓名的逐渐多了起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风尚、伦理道德观念不同，在作者的署名方式上也不完全一致。比较简单的是只标某人的姓名，如：“《诗外传》韩婴”。这样的情况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是比较复杂的标著方式，连同作者的字号、籍贯、官职、封号、爵号及著作方式都标出来，或者标出其中的几项。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1. 标明朝代、作者姓名和著作方式。如：“《周易集解》唐 李鼎祚 集解。”这样的标注方式很简单，一看即懂。

2. 标明作者的籍贯、姓名及著作方式。如：“《方言笺疏》嘉定钱绎撰集 仁和王文韶校刊”、“《国语正义》归安董增龄撰集”。

3. 标明作者的籍贯、姓名和字号。清人袁枚的文集《小仓山房文集》卷端下题：“钱塘袁枚子才。”钱塘是袁枚的籍贯，子才是他的字。南宋张炎的词集《山中白云词》，题为“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张炎原籍天水（今甘肃省天水），旧为西秦，他字叔夏，号玉田。

4. 标明作者的时代、官职或封爵、姓名和著作方式等。《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汉表示时代，左中郎将是官名，伯喈是蔡邕的字。《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魏表示时代，陈是封地，曹植曾被封为陈王，思是他的谥号，这是时代、封爵、谥号和姓名连写的。

5. 不署作者真实姓名，另起别号。封建社会轻视小说、话本、杂

剧等文艺作品,以为这些体裁的作品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流。作者也往往因此受到歧视,不愿或不敢用真实姓名。长篇小说《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其真实姓名,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未取得一致意见。白话短篇小说选集《今古奇观》,署名为“姑苏抱瓮老人”,我们只知道姑苏是今天苏州市的别称,抱瓮老人来源于《庄子·天地篇》,其真实姓名亦不可考。近代小说如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自署“我佛山人”,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自署“南亭长”,曾朴的《孽海花》自署“东亚病夫”,均非真实姓名。

总而言之,我国古籍著者的题名是很复杂的,有的一部书有多个撰注者,有的官名、学位、封爵、著作方式等加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如《汉书补注》卷首的题名:

汉兰台令史班固撰

唐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注

赐进士出身前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加三级臣王先谦补注

对于复杂的署名方式,我们在编目著录时,一般只要抓住朝代、作者姓名和著作方式三项就行了。

二、古籍的书名

书有书名,这似乎是常识,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在先秦,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古人写作,有的叙事抒情,有的论辩说理,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常常是先写作,后命名,或者是单篇流行,后来才纂集成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提到韩非的《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都是韩非著作中的篇名,并没有提到韩非著作总的名称,故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此皆非所著书篇名也。”后来,《汉书·艺文志》著录为《韩子》,一直到宋人的著作中才称为《韩非子》。

《史记·酈生陆贾列传》: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

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可见，陆贾在写作之前，并没有给自己的书起一个名字，而是写好一篇给刘邦看一篇，刘邦认为写得好，才起了个名字叫《新语》。

先秦的古籍，有的当初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而是有多个书名。战国时期游说之风很盛，各个学派为了推行其政治主张，往往通过游说的方式，争取国君的信任和重用。当时有人把这些游说国君的言辞搜集起来，编辑成书以供学习模仿，但名称不一，据刘向《战国策书录》，这部书“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刘向校书时才删去重复，重新编次，定名为《战国策》，一直流传到今天。后世的古籍，一书多名的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

先秦的书籍不标作者，又不题书名，多单篇流传。后来校辑古书者往往把作者不明而性质相近的著作汇集在一起，起一个总名，叫作“某家言”。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有：“《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道家类著录有：“《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法家类著录有：“《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我国古籍书名的命名情况十分复杂，对其进行研究探讨，是文献学的内容之一，既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加深对古籍原书的理解，也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下面就古籍书名常见的命名方式，做一些介绍。

1. 取全书首句的二、三字为书名。汉朝有一种识字课本，开头几句说：“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姓名字，分别部居不杂厕

……”，于是便截取首句的前两个字，取名为《急就篇》。汉朝通行的其他一些识字课本，如胡毋敬的《博学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李长的《元尚篇》，都是用开头两个字为书名。由于这种方式不能体现全书的内容，后世并不多用。

2. 根据书的内容命名。如关汉卿的著名杂剧《窦娥冤》，内容是写一个读书人窦天章的女儿窦娥的冤情。窦娥自幼丧母，被送往蔡家作童养媳。婚后不久丈夫死去。地痞张驴儿欲用毒药害人，结果害死了自己的父亲，他却诬告窦娥为害人者。昏官桃机将窦娥屈打成招，判处死刑。三年后，窦天章为官来楚州察访，窦娥冤魂出现，要求父亲代她报仇。窦天章察明案情，为女儿雪了冤。《窦娥冤》之名，就是根据全剧的内容提炼出来的。《三国志》、《全唐文》、《唐诗三百首》等，都是概括全书内容而命名的。

3. 根据作者的姓名、字、号、谥号等命名。《孟浩然集》、《李贺诗歌编》等都是用作者姓名命名的。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字中郎，其作品集取名为《袁中郎全集》。曹植，字子建，其作品集便命名为《曹子建集》。这是以作者的字来命名的。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号东坡居士，于是其作品集便有《东坡集》、《东坡乐府》、《东坡先生全集》等。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文天祥自号文山，其作品集便取名为《文山先生集》。这是以作者的号为书名。

欧阳修死后谥号文忠，其作品集名为《欧阳文忠公集》。明末诗人陈子龙，死后追谥忠裕，其作品集便取名为《陈忠裕公全集》。这是以作者的谥号为书名的。

4. 根据作者的官职命名。魏、晋时著名诗人阮籍，曾经作过步兵校尉，后世称阮步兵，其作品集便取名为《阮步兵集》。鲍照曾经任前军行参军、前军刑狱参军等官职，人们称之为鲍参军，他的集子名为《鲍参军集》。唐代大诗人王维，作过尚书右丞，其作品集名

为《王右丞集》。

5. 根据与作者有关的地名命名。金、元间著名学者、诗人元好问所编《中州集》10卷，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中州是中土、中原的意思。因为由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曾统治中原百余年，所以金朝遗老便把金朝统治过的地方称为中州，把金朝诗人称为中州诗人，也把这部诗歌总集命名为《中州集》。

有的以作者的籍贯为书名。王安石是临川（今江西省临川）人，他的集子名叫《临川集》。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省永济西）人，后人称柳河东，他的集子名字就叫《柳河东先生集》或《唐柳河东集》。

有的以作者任过职的地方为书名。南朝著名诗人谢朓，曾经做过宣城太守，后世又称他为谢宣城，其作品集被称作《谢宣城集》。唐朝诗人韦应物因做过苏州刺史，其作品集被称为《韦苏州集》。

有的以作者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为书名。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在长安近郊的少陵住过，自称少陵野老，人称杜少陵，故其作品集取名为《杜少陵集》。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晚年隐居故乡石湖（在苏州），号石湖居士，故其作品集为《石湖大全集》。

其他如陆游的诗集名《剑南诗稿》、文集名《渭南文集》，杨万里的诗集《荆溪集》等，均与地名有关。

6. 根据书斋、藏书楼命名。清代著名版本学家鲍廷博，取《礼记》“学然后知不足”之义，命名他的书斋为“知不足斋”，他所编刻的一种丛书，也因此叫《知不足斋丛书》。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收藏宋版书达一百余部，建专室收藏，名曰“百宋一廬”，其所编书目亦名为《百宋一廬书录》。我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其藏书处叫“皕宋楼”，其所编善本书目也因此取名为《皕宋楼藏书记》。

7. 根据成书年代的年号命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和元稹，都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编了自己的作品集，分别取名为《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宋代文学家苏询的集子名为《嘉祐集》，嘉祐是宋仁